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专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专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专辑)
ISBN 978-7-5097-8362-7

I. ①海… II. ①中…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8860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专辑 ·

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编 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张倩郢

责任编辑 / 张倩郢 曹其敏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2.5 字数:352千字

版 次 /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8362-7

定 价 / 9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缘起

自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实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之始，文学研究所在逐步将各研究领域纳入创新工程机制的过程中，也在逐步完善科研队伍的创新结构并激发学术创新点，五年来的研究工作自是一番风生水起。

文学研究所在实施创新工程的方案中，根据各学科特点，对学科片进行了整合，组建了三大创新团队，分别是“中国文学：经典传承与多元选择”的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研究团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中国经验研究”的现代文学、台港澳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团队，以及“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文学理论与当代文学研究团队。三大团队的有机组合，打破了传统研究室的界限，也突破了完全个人化的传统研究模式。以创新项目为核心组建团队，创新首席的作用更加突出，团队共同调研，以及多次的小组讨论和工作坊以不同形式的交流研讨，都使得专题化的研究能够非常有力且有深度地推进下去。

在这样的科研背景下，各个创新团队陆续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如古代文学学科片以经典传承与多元性进程为视角，融入了民族、地域与文化的差异性研究，探讨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转型期文学史研究、民间视角与经验研究、文学经验与价值研究、域外与本土深度互动四个主题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区域，并融入了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理路，重新检视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研究从来都是热点，因为与我们当下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而充满了时代的张力，研究者对这些时代主题的探讨并没有浮在表层而是

进行了深度开掘和理论思辩，体现了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的素养与学识。

文学理论研究在创新视野的观照下，把研究触角延伸到海外汉学领域以及与东亚国家的多边交流活动中。文学研究所于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与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共同举办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时代的中日文学、语言、教育、历史与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该次会议从学术角度对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汇时代的中日两国文学、语言、教育、历史和思想等方面的问题与关系展开深入探讨，并将这些成果汇集成册，不啻为双方留下一份很好的共同纪念。伴随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逐渐受到海外汉学家的广泛关注，文学研究所古代学科的同人有意识地对这些国外汉学研究成果进行译介和讨论，并于2013年12月举行了第一次“海外汉学名著评论”论坛，与会学者在翻译和评论过程中都有很丰富的收获，现在也将这次论坛的论文以及各位学者历年积累的海外论著评论、学术史研究、学术动态介绍和学者访谈等成果汇为一辑，作为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次集中展示，这不仅有抛砖引玉之意，而且希望将这样的交流能够拓展并深入下去。

五年来，文学研究所的创新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很多阶段性成果都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学术刊物上。为了能够集中展现文学研究所在创新工程中的成就，我们将近几年来各团队的优秀成果汇集成册，辑成目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专辑”丛书，以之作为五年来研究工作的一份总结和纪念。

· 目 录

· 专书评论 ·

- 《雅》《颂》的时代、性质及其他
——评家井真《诗经原意研究》 / 马银琴 / 003
- 评康达维等撰《上古与中古前期中国文学
研究参考指南（上卷）》 / 陈 君 / 018
- 手抄本时代的文本生成与诗歌创作
——评《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 / 许继起 / 026
- 评马瑞志的英文译注本《世说新语》 / 范子焯 / 040
- 一部有影响力的西方汉学经典
——评亚瑟·韦利《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 / 陈才智 / 060
- “客气”的诗歌批评
——评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 / 张一南 / 082
- “文”与唐宋思想史
——读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 / 刘 宁 / 086
- 评龙彼得《古代闽南戏曲与弦管之研究》和所辑
《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 / 李 玫 / 100
- 评日本学者中川谕《〈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 / 夏 薇 / 116
- 文本和阐释建构的多元文化空间
——论《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
妇女著述》的文本价值和学术意义 / 王筱芸 / 122

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叙述框架的形成

——尤以明清三大诗说为中心 / 蒋寅 / 145

《剑桥中国文学史》读后 / 蒋寅 / 164

· 综合评述 ·

“近世性”与中国唐宋文学的阐释 / 刘宁 / 175

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 / 蒋寅 / 194

日本中唐文学会印象 / 蒋寅 / 200

川合康三教授的中唐诗研究 / 蒋寅 / 207

拓荒者与开源者

——莱顿大学的早期汉学家（1853~1911） / 包罗史著 王筱芸译 / 213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群体

——以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为中心 / 王筱芸 / 249

吴淳邦教授与韩国的中国小说研究 / 李芳 关瑾华 / 277

韩南的《中国白话小说史》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域外视野 / 孙丽华 / 284

· 访谈 ·

汉文化整体研究

——陈庆浩先生访谈录 / 刘倩 / 303

汉文文学史与汉文化整体研究

——访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陈庆浩

/ 刘倩 / 316

回到核心

——浦安迪先生访谈 / 刘倩 / 322

走近浦安迪先生

/ 刘倩 / 333

· 短论 ·

读刘正著《海外汉学研究》 / 陈才智 / 341

简评《浦安迪自选集》 / 刘倩 / 351

专 书 评 论

《雅》《颂》的时代、性质及其他

——评家井真《诗经原意研究》

马银琴

在当代日本汉学界，家井真教授是一位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者。在《诗经》《楚辞》等研究领域，他都因其独特的建树而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在《楚辞天问篇作者考》一文中，他依据《淮南子》与《天问》之间所问问题与内容上的相似性，提出《天问》的作者并非屈原，而是淮南王刘安。这一观点遭到了国内学者的批评。徐志啸先生在《日本学者的楚辞持疑论》一文中说：“家井真的上述见解及看法，其实存在明显的漏洞及难以自圆其说之处：其一，单凭《淮南子》与《天问》之间在所问问题与内容上的相似，就能判断两者同出一人之手？《天问》产生于战国时代，《淮南子》产生于西汉时代，后代作品与前代作品在内容上发生一些类似甚至某些重合，这是不奇怪的现象，以此推断两者同出一位作者之手，是否太大胆了些？”^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学者对其《诗经》研究的推崇。石川三佐男先生在第六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文章《从日中比较角度谈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设专节讨论“日本学者家井对于《诗经》的最新研究方法”，认为“家井先生继承了赤塚忠的学说并加以批判性、实证性发展”，其中着重介绍了《关于诗

^①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经·王事靡盬的解释——经学研究的建议》《诗经中〈颂〉的发生》《诗经中〈雅〉〈颂〉的发生与成立》《诗经中关于君子的解释——以祖灵祭祀诗为中心》等文，并认为后两篇文章“堪称功彪诗经学史册、前无古人的硕果”。该文同时还说：“2002年1月家井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二松学舍大学审查，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该论文被认为是对以上成果的综合系统的总结，并将于今年出版。”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就是本文准备讨论的《诗经原意研究》^①。

《诗经原意研究》一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章“关于《雅》、《颂》”，着重讨论《雅》《颂》的产生和形成问题。在确认“《雅》、《颂》诸诗是在明确的文学意识下，对钟的铭文加以提炼，使其文学化的结果”（P41）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对《清庙之什》《臣工之什》《甫田之什》重新进行编排与解释。第二章“关于兴词”的讨论，建立在如下观念的基础之上：“《诗经》中的‘兴词’最初是由咒谣发展成的咒语，它的形成与古代礼仪中的习俗密不可分。”（P135）立足于此，作者着重讨论了“鱼”“花、果、草、木”及“渡河”三组兴词的象征意义。第三章“《诗经》诸篇诸问题”，则对广泛出现于《诗经》中的“君子”“王事靡盬”“钟”等问题做了综合性的讨论。

正如本书译者陆越所言：“此著出版至今已有六年，今天读来仍不乏新颖之感。特别是其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资料都有独到之处。”对于本书在研究视角、方法等方面的成就，燕燕《家井真〈《诗经》原意研究〉的方法论以及对国内身体哲学研究的启示》^②一文将之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文字训诂：直显知识的身体性的门径”、“文献考索：复现诗歌的宗教原意的路数”、“文化世界：源于宗教祭礼的身习之仪的投射”、“宗教还原：我们对身体有了怎样的认识”。这四个方面的归纳虽然只是立足于身体哲学研究的视角，但“文字训诂”“文献考索”“文化世界”“宗教还原”四个关键词，毋庸置疑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该书中发人深省的观点的提出，无一不是经过“文字训诂”“文献考索”等过程而来。例如，作者

① 家井真：《诗经原意研究》，陆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② 燕燕：《家井真〈《诗经》原意研究〉的方法论以及对国内身体哲学研究的启示》，《世界哲学》2012年第6期。

对《清庙之什》的“什”的考订即具有代表性的意义。作者在首先引述陆德明《经典释文》与朱熹《诗集传》的解释之后说：

两者都认为这种表述仅仅是图其方便，并无实际意思。但是，《说文》“章”字则曰：“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段注，说从十之意。）以为“章”是由“音”和“十”构成的会意字，并明确表明字素“十，数之终也”。这完全是因为许慎把乐章十篇作为一章来考虑的结果。再者，《说文》“竟”字曰：“竟，乐曲尽为竟。”即乐曲终了之意。可以想见，这正是许慎把乐曲、乐章十篇作为一个单位“什”考虑的原因所在。

据此，作者得出了如下结论：“《诗经》中所用‘什’并不像陆德明或朱熹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把十篇归为一卷，而是对乐曲、乐章十篇作一总括的意思。因为乐曲、乐章十篇正好可以把某个整体歌咏完毕。……因此《颂》中的‘什’就是在宗庙前庭表演的十幕一场的宗教舞蹈诗。”尽管十幕一场的“宗教舞蹈诗”的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但上述考索，从文本编纂的角度揭示了《诗经》最初被编集时与乐曲、乐章之间密切的关联。

该著题名为“《诗经》原意研究”，作者所要追寻的“原意”，“并非经过圣人教诲的经学范畴内的意义”，而是指更为早期的与宗教活动相关联的起源意义，该书第二章对于“兴词”的讨论，即十分突出地展现了作者在追寻诗歌原始宗教命意方面的努力与成就。

立足于其师赤塚忠先生“兴词就源于咒词”的观点，该书认为：“《诗经》中的兴词最初是由咒谣发展而成的咒语，它的形成与古代礼仪中的习俗密不可分。神圣的礼仪用咒谣，随着礼仪本身所具有的神圣性逐渐消失，其间蕴含的意义也就随之淡化。人们最终忘却了咒谣的真正含义，只是将形式化了的咒语记忆在心，永久地传唱了下来，并笼统地解释为‘托事于物’、‘兴物而作’，‘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P135）以此为基础，立足于对诗义、礼仪、民俗的综合理解，通过文字训诂、文化溯源的方法，具体地分析了“鱼”“花、果、草、木”及“渡河”等兴词中

所潜含的原始的咒术内涵。提出“鱼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以及旺盛的生殖能力，致使古代中国人坚信它具有符咒力，他们祈祷这种力量通过类感符咒术带来大地的高产——谷物丰饶”（P150），修正了闻一多所提出的鱼“多为性的象征，故男女每以鱼喻其对方”的观点；通过中日文化的比较，提出“《诗经》中兴词所咏花、果、草、木都是神灵降临的化身。咒物花、果、草、木，要么是祖灵，要么是水神、社稷神、春神、或者夏神，要么就是男女灵魂的凭依”（P175）。通过对水神崇拜的梳理，提出“渡河源于水具有咒力的意识观念。水汇聚成河给大地带来滋润，带来谷物的丰饶。……河川具有的多产咒力，通过类感巫术还可联结男女的多产。所以，歌咏渡河的兴词要么是水神祭祀歌，要么是预祭仪式歌，要么是歌咏恋爱、婚姻的。到了汉武帝时期，结合渡河仪礼、星辰信仰、汉代纺织女工的悲怨等诸多元素的牛郎织女相会的传说雏形基本形成”。语言与文字是一个民族历史记忆的结晶，“兴词”作为一种特殊的“套语”，其中必然沉淀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情感。且不说每一种兴词所蕴含的独特内容，即使是同一种物象，当它被用不同的名称称呼时，便具有了不同的感情指向。王靖献在研究《诗经》套语结构时，曾就“仓庚”与“黄鸟”的不同做过讨论：“在《诗经》传统中，‘仓庚’与‘黄鸟’都是‘莺鸟’的不同名称。……对‘莺鸟’名称的不同叫法，都会影响诗歌的基本意义。‘仓庚’看来是强化诸如婚礼仪式一类的愉悦幸福时刻的‘名词主题’……而‘黄鸟’则用于引起悲叹之情的诗歌。”^①家井真在分析沉淀于《诗经》兴词之中的宗教符咒性特征时，也发现了这种符咒性特征对诗歌内容的制约与影响：“兴词歌咏的咒物所具有的不同符咒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们对诗歌意义、内容的理解……这也正是笔者分析《诗经》诸篇时，缘何要明确其兴词所咏咒物、咒性行为的宗教意义的原因所在。同样，若是不了解花、果、草、木在古代日本所象征的宗教意义，就难以对日古代歌谣进行正确的诠释。”（P175~176）尽管书中对于每一个具体兴词宗教符咒性内涵的分析未必精当无疑，但是，把兴词作为形式化了的咒语进行研究

^① 王靖献：《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谢谦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第140页。

的观念和方法带给我们的启示却是深刻的。

除了关注潜沉于“兴词”之中的宗教符咒性特征，作者尤其重视《雅》《颂》诸篇作为宗教歌舞诗的性质与来源。可以说，对《诗经》《风》《雅》《颂》之名称内涵、诗歌来源及歌咏方式、场合的讨论，构成了《诗经原意研究》一书的中心内容。其核心的观点可摘录如下：

颂是从表示舞姿之意的“容”字假借来的。《颂》诸篇是一种与宗教相关的诗歌，规定在行天子礼的周国以及被允许行天子礼的鲁、宋的宗庙里举行。由供职于宗庙的巫师们演奏、歌咏、舞蹈时使用，是一种宗教性舞蹈诗。（P14）

《雅》的名称则源于“夏”的假借字，是在周、诸侯的宗庙或神社由巫现歌舞的宗教假面歌舞剧诗。同《颂》一样，其目的也不外乎祭赞神灵、祖灵，以祈求保佑。由此而见，两者产生的基础是相同的。（P42）

“风”为“凡”之假借字，原意为降神，招神。《国风》诸篇歌咏农民等每逢季节变更之际，在家庙、村落的圣地、神社等地举行地方祭祀。目的在于祝贺婚姻，迎祭季节神、河川神等各方神灵，祈祷谷物丰收等。（P130）

《诗经》中《雅》《颂》诸篇的产生，是以铸刻于宗庙彝器上的铭文为诗歌母体，在继承和保持其宗教性的同时，有意识地强化并提炼其文学性的文学化过程。（P41）

《雅》《颂》诸篇以铭文诗为母体，作为用于宗庙、神社的宗教歌几乎同时产生于公元前四世纪初期到中期。（P42）

上述观点，构建起全书讨论的理论框架。比如，在《雅》《颂》诸诗来源于宗庙彝器铭文，是在继承其母体宗教性的同时进行文学化的认识基础上，作者依据铭文的结构顺序对《清庙之什》《臣工之什》重新做了编排与阐释；在《雅》是假面歌舞剧诗的前提下，作者认为《诗经》中绝大多数的“君子”“异人”及“客”等，都是戴着祖灵假面，在宗庙或神社的祭祀仪式上舞蹈的祖灵之尸；在《风》是各地古俗降神歌的认识基础

上,认为《诗经》中三篇《羔裘》中的“羔裘”是宗庙里的尸所用的毛皮大衣,作为“祖灵附着的咒物”,成为“宗庙里参与祖灵祭祀的子孙们着用的礼服”。不可否认,这些观点是富有想象力和开创性的,但是,它们是否具有坚实的论据支撑呢?《诗经》诸篇是否就是青铜铭文文学化的结果呢?铭文和诗篇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雅”是否来源于被指为假面的“夏”?《雅》《颂》诗篇是否仅为祭祀、神灵、祖灵而产生?祭祀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用途?如何理解出现在《诗》中的“客”“羔裘”及与之相关联的文化属性与差异呢?

首先来看铭文与《诗经》的关系。在《诗经原意研究》一书中,作者对此做了专门的讨论。他的分析分为三个步骤展开:首先,他通过分析大丰与微繻鼎铭文的用韵、结构及语言形式,认为“供奉于宗庙的彝器所刻铭文是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形式,以四字为主的诗歌,而且,在祭祀祖灵时,都要演唱这些诗歌”(P25)。也就是说,铭刻于钟鼎彝器上的铭文,是在祭祀祖灵的仪式上演唱的文本。其次,作者通过比较出现在《雅》《颂》诗篇与铭文中的成语的相似性,认为“《雅》《颂》诸篇中与铭文类似、相近的成语,多数是经过整理并发展了的铭文成语,其表现方法和内容已经不断趋于丰富。由此说明,铭文(是)先行于《雅》《颂》诸篇的韵文,这种推测是有据可依的。”(P26)最后,以上述论断为基础,作者进一步讨论了钟鼎彝器的制作年代,并依据石鼓诗和王孙遗者钟的铭文“都已具有相当的诗作完美度,与《诗经》中《雅》《颂》诸篇相比也毫不逊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雅》《颂》的四言诗型,是在王孙遗者钟年代,即公元前394年前后略加修改而成为《雅》《颂》诸篇模式的。换言之,《雅》《颂》诸篇的形成,是以铭文诗为基础并逐渐成熟后才得以可能的。”(P39)

尽管作者宣称“《诗经》诸篇的诗是与王孙遗者钟的成器基本同时代或稍后的公元前4世纪中叶完成的,这个推论绝非无凭之说”(P39),但是,作者的上述论证过程却存在着极大的论证空白。首先,其所提出的铭文要在祭祀祖灵时演唱的观点,并无任何证据的支持,而是想当然的结果:“既然‘钟’本身就是一种咒物,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钟上面所刻铭文亦为神圣之物。所以,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在乐器‘钟’的伴奏下,

巫师们一边看着钟上的铭文，一边歌咏的情形。不然的话，铭文是四字句为主的诗歌说就难以成立。”（P28）在以宗周钟铭文为例分析钟铭的内容与格式时^①，他又说：“正如铭文第三章所歌咏的那样，此钟是馡向祖灵祈禱时所用之物，想必上面所刻的铭文就是歌咏之用。”（P29）那么，钟鼎彝器的铭文是否能够用于仪式歌咏呢？

《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鲁国借助晋国之力战胜了齐国，季武子打算用从齐国军队缴获的武器制作林钟，臧武仲评论说：“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今称伐，则下等也；计功，则借人也；言时，则妨民多矣。何以为铭？且夫大伐小，取其所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铭其功烈，以示子孙”这句话点明了钟鼎彝器之所以勒刻铭文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礼记·祭统》所云：“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结合青铜铭文的研究可知，绝大多数的钟鼎彝器及其铭文，都是建立功勋者或接受赏赐者的记事铭功之作。如《静簋》：“佳六月初吉，王在莽京，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官，小子及服、及小臣、及夷仆学射。八月初吉庚寅，王以吴棗、吕刚会敷盞自、邦周射于大池。静学无弔，王易静鞞剡。静敢拜（颡）首，对扬天子不显休，用乍文母外姑尊簋，子子孙孙其万年用。”^②它们或兼有“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的意思，但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铭其功烈，以示子孙”，因此，铭文大多以“子孙永宝”或“其子子孙孙永用”结束。

当然，作为礼器的青铜彝器，也有专为祭祀而制作的，但是这一类铭文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西周早期，祭祀铭文大多比较简短，如“北子宋乍文父乙宝尊彝”^③等，比较复杂的，如西周穆王时的伯戣簋铭：“伯戣肇其乍西宫宝，佳用绥神怀，效前文人，秉德恭纯，佳勾万年子子孙孙永宝。”一直到西周后期，才出现了长篇的祝辞。与作者所列举

① 作者依据杨树达的研究，系宗周钟于周昭王时。上海博物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编写组《商青铜器铭文选》则以为“馡”即周厉王胡，故定此钟制作年代在厉王朝。

② 铭文隶定文字，依据上海博物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编写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三册，文物出版社，1988，第111页。下同。

③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三册，第100页。

的宗周钟铭文相比，梁其钟具有更为单纯的祭祀意味：

梁其曰：不显皇且考穆穆翼翼，克哲卑德，农臣先王，得纯亡
 改，梁其肇帅型皇且考秉明德，虔夙夕，辟天子，天子肩使梁其身邦
 君大正，用天子宠蓺梁其历，梁其敢对天子不显休扬，用作朕皇且考
 稣钟，鎗鎗鎗鎗，微微鎗鎗，用昭格喜，侃前文人，用祈勺康娛纯祐，
 綽綽通祿，皇且考其严才上，敷敷彙彙降余大鲁福亡敷，用窕用梁其
 身，乐于永令，梁其万年无疆，堪臣皇王，眉寿永宝。^①

马承源先生将梁其钟的时代确定在西周后期的夷王或厉王时。从铭文的格式来看，其篇幅大为增加，且出现了不少四字格式的修饰语，与《诗经》句式颇为相似。但是，仔细研究铭文，我们不难发现，与《诗经》作品之于典礼仪式的“普遍适用性”相比，铭文纪事具有极强的指向性与针对性。即使这篇纯粹的祭祖铭文，也是因梁其被任命为“大正”，即仆官之长而作。作器者的确定性、制作时间的具体性及制作原因、目的的唯一性，都极大地限制了铭文的使用场所。因此，作者所云“在乐器‘钟’的伴奏下，巫师们一边看着钟上的铭文，一边歌咏”祖灵的场景，是令人难以理解，也不可能出现的。当然，周人除了通过勒铭彝器的方式称扬功德，希望通过“子子孙孙永宝其用”达到不朽之外，也需要通过仪式歌舞向祖先、神灵祈祷以获得福佑。只不过，他们所歌咏的诗歌，不是铭刻在彝器上的铭文，而是由乐师职掌、专门用于仪式歌奏，并且主要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和传承的《诗》。

《诗经原意研究》一书依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他们“并未把中国诗歌的产生作为问题进行研究，没有将先于《诗经》或者与之同时代的金文资料作为对象加以充分利用。”（P5）而实际上，《诗经》文句与青铜铭文语词上的相关性，从宋代开始，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清代以来，金文资料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做法成为学者们的通识。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的成语》、徐中舒《金文嘏辞释例》、屈万里《诗三百篇

①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三册，第273页。